

溥仪从故宫带走的珍宝都去哪了

1924年10月,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。然而,早在离宫之前,他就以赏赐胞弟溥杰、英文伴读溥佳为名,将米芾的传世真迹、司马光《资治通鉴》原稿、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等大量国宝珍品分批偷运出宫。从此,这些国宝也踏上一段流亡之路,命运沉浮。这批从故宫流散而出的文物,最后都去了哪里?



田黄石乾隆帝三联印,溥仪最喜欢的清额,一直随身携带,最终回归故宫博物院。

国宝盗运出宫的经过

1912年溥仪退位后,溥仪逐渐萌生出赴英留学的念头。为了暗中筹措留学经费,同时为出宫后的生活做长远准备,溥仪找到胞弟溥杰与堂弟溥佳商议对策。溥仪等人共同制定了“监守自盗”的方案:即以“赏赐”溥杰、溥佳为名,将珍宝“名正言顺”地运出宫外。

1923年2月,溥仪秘密出逃紫禁城的计划被内务府所阻,其出洋留学的计划遂以彻底失败告终。但这批先期运出的书画珍品并未归还宫内,而是在溥佳押运下,足足装满七八十口大木箱后,由铁路运往天津,存放在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内。此后,由于自幼喜欢玉器,溥仪还在被驱逐出宫前,让溥佳等人从养心殿中取出一些便携的珍珠手串,分装两个小手提箱中带出宫外。

津门变卖与“赏赐”

1924年10月,溥仪被驱逐出宫。三个月后,他前往天津,来到日租界内的“张园”居住,并成立了所谓的“清室驻津办事处”。为贿赂政客、拉拢军阀和勾结日本要人,溥仪前后将几十件书画变卖或抵押,以此换取大量的金钱。

当时,有日本侯爵有意购入李公麟的《五马图》,打算进献日本天皇。溥仪直接提议,将《五马图》无偿赠送。同时,溥仪还以2万大洋的价格,将黄庭坚《诸上座帖》等4件名作抵押给天津盐业银行。后因无力偿还借款,《诸上座帖》和米友仁的《姚山秋霁图》被转卖给张伯驹。对于具体经手此事的刘骏业(遗老陈宝琛的外甥),溥仪也“赏赐”了一批书画,其中就有唐人阎立本的《历代帝王图》《步辇图》、五代阮郛的《阆苑女仙图》和宋拓本定武《兰亭序》等极为珍贵的作品。

1931年5月,受美国纳尔逊博物馆委派,史克门抵达天津,通过曾任婉容英文教师的任兰崧(Ransom)引荐,计划向溥仪收购书画。然而交涉过程并不愉快。溥仪最初拿出12件书画,后因双方定价分歧过大而剔出3件,其余9件由史克门一行统一估价购得。但溥仪很快发觉,史克门不仅对这9件作品的出价远不及原拟价格,还额外多取走1件。经交涉后,史克门退回6件,最终购得

明代陈淳的《荷花图》、佚名《仿郭忠恕雪霁江行图》、董其昌《仿黄子久富春山画》,以及清代金廷标的《竹溪六逸》4件作品。

除此以外,溥仪还曾分两次,将部分书画以7万多元的价格卖给了天津锅店街的万昌古玩店。但因两次售卖价格都未达到心理预期,溥仪随后又将一批古玩珠宝作价60万元,卖给了法国古董商罗森泰。

小白楼内的哄抢浩劫

九一八事变后,在日本人的策划下,溥仪逃往东北,出任伪满洲国皇帝。其存放在天津的大批国宝,由其族兄溥修负责管理。溥仪对这些国宝极为关心,经常令人到天津检查,唯恐遗失。

狡猾的日本关东军对中国国宝的重视程度不逊于溥仪。他们认为,将中国国宝运至长春,更有利于对溥仪的控制;即便时局变化,将这些珍宝据为己有也易如反掌。因此,在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的策划下,超过1200件书画被分两次秘密运到长春,入藏伪皇宫东院的书画楼(又称“小白楼”)。

1945年8月,日本败局已定,伪满洲国行将垮台。8月13日,溥仪在极度恐慌中携带宋徽宗《摹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》等几十箱精品文物,逃往通化临江县大栗子沟。在此落脚的几日时间中,溥仪以极低价格将部分国宝卖给周边村民,以换取食物与生活用品。原题名唐韩幹《神骏图》、传为南宋赵伯驹的《莲舟新月图》以及元代赵孟頫的《水村图》等,都在此处流散。8月17日,溥仪计划乘飞机逃亡日本,并精选了百余件书画、珠宝随身携带。但在沈阳机场停歇时,溥仪被苏军俘虏,随即押往苏联赤塔,其所带物品也被一并缴获。

与此同时,在溥仪逃出长春的次日,小白楼内未及运走的历代书画便遭到伪满禁卫军的洗劫。这些昔日守卫伪皇宫的禁卫军士兵蜂拥闯进楼内,将珍宝一掠而空。一位孔姓士兵,仅手卷、字画就劫走了一皮箱30多件,其中有唐寅、董其昌、严嵩等人的作品。哄抢之中,还有不少书画被撕损为数段。北宋李公麟的《三马图》、米芾书于澄心堂纸上的传世名迹《苕溪诗六首》、南宋牟益的《西岳降临图》、元代高克恭的

《秋山暮霭图》和王迪简的《凌波图》、明代沈周《写生三味图》与《淇园春雨图》、文征明的《赤壁赋图》合卷等传世名作,皆遭此劫。

国宝的最终命运

整体来看,溥仪携带出宫的珍宝,大致有以下几种命运:

惨遭毁坏

如前文所述,小白楼里的书画遭到士兵的争抢。在此过程中,有士兵因争抢不到完整的书画,竟将手中残片付之一炬以泄私愤。比如,明代中期无锡名家王问绘制的《万松图》,卷长7米以上,笔墨淋漓,备受明清两代收藏家珍视。但卫兵在抢夺中大打出手,将其撕得粉碎后仍不罢休,为平息心中所谓的怒火,竟将画卷碎片用火烧毁,化为青烟。

还有一位名叫王学安的士兵,将抢得的一批唐宋书画带回家乡后,在未采取任何保护措施的情况下,就将这些国宝匆匆埋入地下保存。最终,包括南宋朱熹书法在内的大多作品,都被潮湿泥土严重腐蚀而断裂脱裱、色彩尽褪,无法进行修复和挽救。

重归国内馆藏

同时,不少珍品也通过征集调拨、民间捐赠、海外回购等多种途径,重回国内文博馆藏之列,分别典藏于故宫博物院、辽宁省博物馆、天津博物馆等机构。

小白楼遭哄抢时,一批宋元秘籍因不便携带而幸免。后经张嘉璈、金毓黻等人收集整理,这批珍宝于北平和平解放后,全部入藏北京图书馆珍本库。而自东北流出的隋代名家展子虔仅存的传世孤品《游春图》,由张伯驹斥巨资于琉璃厂购藏后,最终无偿捐献故宫博物院。

《韩熙载夜宴图》被张大千以500两黄金收入囊中,1953年其迁居海外前夕,将这幅名作连同另外两卷书画,作价售归故宫。

在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,溥仪还先后上交了一批随身携带的珠宝玉器,后经有关机构移交故宫博物院收藏。其中一件“田黄石乾隆帝三联印”,是乾隆做太上皇时所镌,由一块精美的田黄石雕刻而成,三方印链连在一起。溥仪在出宫后就随身携带这方小玺,直到1950年交出。此外,这批文物中还有18世纪外商进贡的精制怀表、金镶钻戒指、金缕丝嵌珠手镯、碧玺十八子手

串等珍贵的金银首饰和钻翠珠宝。

至于苏联红军查扣的部分溥仪书画,则被转交给东北民主联军,后又被东北人民银行代为保存。溥仪的侍从、家眷等人携带的大批书画和珠宝,也由东北民主联军通化军区登记造册后,转交给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。1949年7月7日,东北博物馆(辽宁省博物馆前身)成立。此前查获和征集到的清宫散佚书画,就从东北人民银行和东北文物保管委员会这两处机构,统一转拨进博物馆。我们如今熟悉的很多名作,比如东晋《曹娥读辞卷》、五代董源《夏景山口待渡图卷》、宋代马麟《荷香清夏图卷》、元代王蒙《太白山图卷》、清代王翬《临富春山居图卷》、王原祁《西湖十景图卷》等,都在其中。

溥仪在天津变卖的部分文物,大多也比较幸运地有了好的归宿:最终入藏天津博物馆。例如能反映清朝后妃用印制度的“祺皇贵太妃之宝银玺”,是溥仪为皇祖重制玉册、改镌玉宝时所制的银印玺,在1958年由天津文化局划拨给天津艺术博物馆(天津博物馆前身之一)。

亦有少数文物仍在民间辗转流传,并陆续现身各大拍卖会场,屡屡创下天价,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。

例如在2015年北京保利十周年秋拍上,曾入藏小白楼的文徵明《杂咏诗卷》以8165万元成交。清人唐岱仿关仝的《溪山雪霁图》,也在2017年中国嘉德春拍上拍出3450万元的价格。

漂泊海外

此外,经溥仪盗运出宫的清宫瑰宝,还有相当一部分最终落入美、日等国的公私藏家之手。

溥仪“赏赐”给刘骏业的几件画作中,阎立本《历代帝王图》不久即归梁鸿志所有,之后梁氏将之转售给日本人,最后又被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购得。而美国纳尔逊博物馆除了藏有史克门在天津购买的四幅画作外,又先后收购陈闳的《八公图》卷、江参《林峦积翠》、丁云鹏《五像观音》、乔仲常的《后赤壁赋图》等多幅溥仪运出宫外的珍宝。

此外,北宋李公麟的《潇湘卧游图》为日本人菊池惺堂所购,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。宋末元初郑思肖的《墨兰图》,被阿部房次郎所得,后人藏大阪市立美术馆。金代王庭筠的《幽竹枯槎图》则收藏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。

时至今日,溥仪携带出宫的珍贵文物,其流散余波仍未平息。文物流落海外,是中华文明之痛;流失文物回家,是华夏儿女之责,我们也期盼着。

伯凌 来源:《国家人文历史》

梁启超与“小说界革命”

1898年9月,戊戌政变后,梁启超前往日本。10月,他在日本创办《清议报》,规定政治小说为刊载的6项内容之一。他在该报第一册上译载了日本著名政治小说《佳人奇遇》,并写了一篇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。

1902年春,梁启超又创《新民丛报》,登载了两部未完的传奇剧本《劫灰梦》和《新罗马》,说明创作小说戏曲的目的在“振国民精神”“把一国的人从睡梦中唤起来”。

他于同年11月在横滨创办了中国第一本小说杂志《新小说》(至1906年1月停刊,共出版24期),以小说创作为主,兼及理论、笔记等。他在创刊号上发表了《小说与群治之关系》,号召开展一场“小说界革命”运动。在这本杂志上先后发表过吴趼人的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《痛史》《九命奇冤》和梁启超的《新中国未来记》等重要作品,还发表过楚卿的《论文学上小说的位置》、松岑的《论写情小说与新社会之关系》等论文;从1903年第7号起,还仿诗话、词话体例,开辟《小说丛话》专栏,促进了小说批评的发展。

梁启超第一个在国内提出“政治小说”的概念:“政治小说者,著者欲借以吐露其所怀抱之政治思想也。其立论皆以中国为主,事实全由于幻想。”他还首先在我国将小说划分成为理想派与写实派两种,认为小说种类虽多,未有能超出此两派范围外者也。也就是今人所习称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两大创作方法。此外,梁启超还总结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:一曰熏,“熏也者,如入云烟中而为其所烘,如近墨朱处而为其所染”;二曰浸,“浸也者,入而与之俱化者也”。

梁启超所倡导的“小说界革命”,是为其政治革新运动服务的。他大力提倡政治小说,对于推动维新变法,提高小说的社会地位,产生了积极影响。

颜士州